

中国章回小说与话本的蒙文译本

〔苏〕李福清作 田大畏译

美国S·杜兰教授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杂志1979年第2期提出中国古旧小说满蒙译本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问题。的确,认真考察这些大多以抄本形式留存的译本,不仅对于满蒙文学史和十七至十九世纪远东文学联系的研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学史本身的研究,都能提供许多崭新的材料。当然,最理想的是同时对中国小说的满文和蒙文译本进行考察,因为蒙古人往往不是直接从汉文翻译,而是从满文转译,但这是作者的能力所不及的。本文目的只是对中国章回小说与话本的蒙文译本作一番综述。在查访和阅读蒙文抄本的过程中,曾得到几位蒙古学专家的热心协助,作者借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如果说自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陆续译为满文的中国小说,始终停留在满文翻译文学的地位,那末,在蒙古人当中,中国小说一方面以其题材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蒙古口头文学——取材于中国小说的蒙古说唱作品“本子乌里格尔”(bengsen-ü üliġer)①的产生;另一方面,又为十九世纪中叶《青

-
- 本文是作者与谢马科夫合写并发表于《蒙古的文学联系》文集(莫斯科,1981,第234—279页)的一篇长文的概要,同时又增加了若干新的资料。

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五传》等吸收了远东小说经验的第一批蒙古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基础^②。例如，我们知道，旺成巴尔和他的儿子尹湛纳希写成的《青史演义》，有一些情节的铺叙是受了罗贯中《三国演义》相应段落的影响，而尹湛纳希的《一层楼》则是对曹雪芹《红楼梦》的创造性改写。

关于存在着中国小说蒙译本的最初消息，是偶然间获得的。上一世纪末，著名德国汉学家威廉·格鲁伯在北京购得一部古老的蒙文抄本，那就是蒙译中国小说《反唐演义》^③。二十世纪初B·劳费尔写第一部《蒙古文学史纲》，只提到这一部译自汉文的小说，因为当时学术界对其它译本还毫无所知^④。

目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美国、丹麦、瑞典等国的图书馆，都发现了蒙译中国古旧小说的抄本。内蒙和中国其它图书馆藏有哪些小说译本，我们原不甚了解，仅知道那里发现了《红楼梦》蒙译本的几种抄本^⑤。但是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的图书馆藏蒙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⑥（以下简称《联合目录》），极大地补充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知识。到目前为止，以在乌兰巴托蒙古国家图书馆藏中发掘出的这类抄本为最多。应说明一下的是，这些译本在蒙古族居住地域的流传是很不均匀的。大多数抄本的译写和流传，是在今日内蒙的疆域内，以及在1911—1921年外蒙自治时期的首府库伦。若干抄本似乎曾在西蒙及新疆境内的西部蒙族（卫拉特人）中流行，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讲到。但有一个特点，在拥有大量蒙文抄本的布里亚特（乌兰乌德市）藏书中，连一本中国古旧小说的译本也未发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十七世纪迁入俄境的卫拉特人后裔）那里，也未见这类抄本。

应当指出，虽然蒙古人及其先辈契丹人差不多从十世纪起就有了雕板印刷术，可是中国小说的译文，直到二十世纪初，

看来仅仅以手抄方式在他们当中流传。这种流传方式造成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即不仅同一译文有了大量抄本(这是自然的)，而且同一作品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译文。这显然是因为某一作品抄本仅流行于某一地区，另译者可能根本不知道该小说已有译本。蒙译中国古旧小说未见刻本，似乎是由于印刷业集中于喇嘛寺庙的缘故。喇嘛本人爱看这类译本，但是大概认为它们没有交寺庙印坊传刻的价值。有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例：著名俄国蒙古学家鲍·亚·弗拉基米尔佐夫1926年赴蒙古和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在北京喇嘛庙嵩祝寺的印坊内发现并购得了蒙译图书的手抄本，然而在那里连一部小说的刊本也未见到。当时与弗拉基米尔佐夫同在北京的著名汉学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在一本未发表的日记里(1926年8月15日)，对这件事有以下的记载：“与弗拉基米尔佐夫同去嵩祝寺，主人为我们准备了访求已久的蒙古小说(指蒙译中国旧小说——李注)抄本，《二度梅》、《七国志》、《十六国》^①等等。要价高达96美元。我十分笨拙地讨价还价，但未能压低到85美元以下(由45美元还起)。原来这类东西的搜求者大有人在(劳费尔，日本人，法国人——成帮结伙，美国人Nicholsy)。交谈甚为欢洽，在一间闷热的禅房内进行了一小时，也许还要长久。购书事谐后，弗拉基米尔佐夫凯旋而归。”这段记载证实了我们的想法：喇嘛寺庙及其附设的印坊拥有中国旧小说译本，但从不刊刻。最早出现蒙译中国小说印本，还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事。蒙古文人特木格图1923年在北京成立“蒙文书社”，专事搜集蒙、藏、汉文古旧图书及印行蒙文著作。所印有蒙译《西汉演义》(1925年)等，1928年出版《三国演义》新译本，是特木格图本人翻译的^②。此外，该书社还于1928年印行了蒙译《聊斋志异》^③。特木格图的出版和翻译活动，是出于他对蒙古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心。他写道：“目前精通蒙古文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许多蒙古文籍已成为罕见图书。如果这种状况不予改变，

我们的文学将有完全消失之虞。”^⑩据我们所知，三十及四十年代没有刊行过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到了五、六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才根据旧译本印行了《今古奇观》和《昭君传》。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出版了几种最流行的中国旧小说的蒙译本。

三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编纂了第一本这方面的书目，把这类手抄本的主要部分都收录了进去。1937年在乌兰巴托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亚洲部蒙古图书及抄本目录》^⑪。后来，这家蒙古最大的图书馆馆藏抄本的著录工作，又由蒙古目录工作者扎丹巴继续进行。他于1960年印出了一本《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文学作品抄本目录》^⑫（以下简称“扎丹巴书目”）。扎丹巴简要著录了大批稀见手抄本，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古旧小说译本。然而，他与他的前人一样，并不打算指出它们的中文原书，仅对现有抄本作了形式的著录。六十至七十年代，始有著名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教授（波恩大学）编成西德和东德图书馆以及哥本哈根图书馆馆藏蒙文抄本的详细著录^⑬。嗣后，在他的两卷本《蒙古文学》里，参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英文版）以及其它英、德文著作，对学术界已知的手抄本的中文原书作了初步勘定。

与海西希教授不同，本文作者不是蒙古学家，而是以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为专业的汉学家。我是由于研究蒙古“本子乌里格尔”说唱节目的关系，才对蒙译中国古旧小说抄本问题发生了兴趣。本人在蒙古同行的协助下，阅览了乌兰巴托收藏的大量抄本，此外也查阅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图书馆的收藏，在两地又得到蒙古学家阿·萨兹金和兹·柯西扬年科的热情指教。

作为汉学家，本文作者的目的是，借助于孙楷第名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柳存仁教授所著的该书补编^⑭以及其他中国著作，对目前能加以甄别的中国小说古旧蒙文译本，提供一份尽可能详细的目录。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作者曾查阅过

部份小说的汉文原书，与译文对照，以核实自己的判断。除了阅览抄本，本文作者还依据询问蒙古说唱艺人所得的资料；他们当年曾读过若干小说的抄本，并用作他们的“本子乌里格爾”的故事梗概。

可惜的是，见到的译本远远不能全部判明其汉文原作。其原因，是蒙古译者往往更改原来的书名，还因为所译的小说，不但有家喻户晓的，也有一些可能当时即是稀见而后来孙楷第、柳存仁及其它编者又未加收录的作品。具体例子将在下面指出。已发现的抄本，能比较可靠地判明原著的，大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为便于著录起见，章回小说，我们采用中国传统的分类法，即讲史、烟粉、灵怪、说公案及讽喻等类，而话本则自成一类。

遗憾的是，中国小说的蒙译本绝大多数都没有署明年代。可以推定，这些书翻译的时间，是在十八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下面将说明理由）。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最早译为蒙文的小说，大概是蒙古读书人以佛教（喇嘛）教义加以解释的那些作品，如《锤国母》和吴承恩《西游记》便是。在蒙古人看来，《西游记》所描写的，是凡人求得佛教所谓“解脱”的正途。

阿·萨兹金在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里发现了一本蒙古人手抄的薄薄的书目，所收录的都是译自汉文的书籍。它对于判断译本的年代有一些帮助。这本书目是俄国外交部亚洲司1864年转交给前亚洲博物馆图书馆的，该博物馆就是东方研究所的前身。因此，所收录译本的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十九世纪中叶。这本蒙古书目与一般古旧中国书目不同，它尽管也收录了儒家经籍，但并不以经籍为首类，而是从小说目录开始。这一点颇有意思。这说明，中国文学中对蒙古人最有吸引力的，是具有民主性的小说。小说占了全部篇名的整整一半（三十四种之十七）。这本未标名称的书目，以下我们姑且称为

“列宁格勒书目”。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中国讲史小说译为蒙文的有下列几种：

《列国志》（扎丹巴书目，第13页）。译本见于“列宁格勒书目”，足证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十九世纪中叶。另有东京存抄本两种^⑤。中国有抄本四种（见《联合目录》246—247页）。

《锋剑春秋》 罕见小说，演古代兵法家孙臆战争事。（扎丹巴书目，第112页）。

《七国志》 有抄本三种：一种书名为《前七国志》，存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另一种存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以下简称为“列宁格勒分所”）弗拉基米尔佐夫藏书，第三种存于东京。中国藏三个抄本（见《联合目录》241页，书名为《前七国》）

《钟无盐》 在蒙古极为风行的小说，有许多抄本，书名略异。哥本哈根存三种抄本，马尔堡（西德）、乌兰巴托图书馆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各存一种。后者所藏是以佛经叶子形式书写的抄本，似是出于内蒙，由著名蒙古学家阿·德·波兹德涅夫携回，另一抄本书名为《齐国皇后钟无盐传》，由蒙古达木丁苏伦院士私人收藏，全27册，缺第一册。抄本首页有题识，称该小说于清崇德年间（1636—1644）译为满文，蒙古王爷策伦扎布于十八世纪初由满文译为蒙文，后来甘丹·拉布查喇嘛于土鸡年（1729年或1789年，后者可能性较大）过录为佛经叶子形式的抄本。看来，晚期的册子形式的抄本，就是以此为底本。达木丁苏伦收藏的抄本写成于1868年。内蒙古

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藏两种（《钟无盐传》、《钟国母传》）抄本（残）。（见《联合目录》294，301页）。

考订此书的满文（似乎早已亡佚）和蒙文译本所依据的汉文原著，颇为不易。孙楷第书目及其它目录中都未见到这部小说。承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陈毓黻赐教，我们得悉中国有一部几乎已成孤本的《新刻钟无艳娘娘全本》，璧经堂藏板，十二册，又名《钟国母》。（可注意的是，蒙古说书人的节目中，这部书就称为《钟国母》）。书分六集，六十四卷。然而它却不是用散文而是用七言诗形式写成的，个别地方增添二、三字，是中国民间文学中极典型的句式。这很可能是流行于广东一带的“木鱼书”^⑩。它是否即为满蒙译文的底本，必须核对文字，才能作定论。目前中国所存刊本虽然是在距离蒙族居地以及当时满族文化中心都十分遥远的广东省传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木鱼书”和蒙文译本，开始部分内容一致；乌兰巴托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几种蒙文抄本，其中一种的第一本标目为“齐宣王应梦寻中宫皇后，钟氏仙女李园遇圣君”，而木鱼书第三则《苍山打围》所讲，也是宣王得一谶梦，告他将遇下凡星辰西王母之女，后来打围入桑园，果遇钟无艳。还有资料证明，讲“钟国母”故事的民间作品刊本，十八世纪也曾流行于北京一带。《红楼梦》脂评（第二十二回）有“……若使顺手拈一本近时鼓词，或如《钟无艳赴会》……等草野风邪之传……”等语^⑪。脂砚斋评注记年为1760年（乾隆庚辰），作者当时在北京，据此，想是民间讲钟无盐故事的作品，无论是在中国的南方或北方，都曾流行。鉴于鼓词和弹词往往是由著名小说改编，因此可以揣测，以上两种民间唱词的兰本，就是满文和后来的蒙文抄本据以译出的那部现已亡佚的中国小说。讲钟无盐故事的小说（？），还有一种不知年代的越南文译本，书名是《钟国母》，散文，四十六集，每集若干回，回目与蒙译本大同小异，存西贡社会科学图书馆。所据底本，也不清楚。

“钟国母”（其名为钟离春），齐宣王后，以出生邑封无盐君，虽然见于自刘向（公元前一世纪）《列女传》以后的文籍，但有关她的故事，在汉人中流传远不如蒙古人中普遍。蒙古人普遍把钟王后看作神通广大的天女，这与上面所讲的汉人关于钟无盐是西王母之女下凡的概念，有一定关系，遂使这部小说在蒙古得以风行。例如扎姆查拉诺藏书中的此书蒙译抄本（“列宁格勒分所”藏本）上，题有这样一行文字：《奉女天尊救命下凡平定中国内乱广大神通钟氏腾格里（天神）功业记传》。蒙古说书人讲钟国母故事还有一定禁忌，（例如：禁说个别段子；邀请说书人的主家在开讲前必须焚香祝祷；说书时不得离开小说规定的情节等等），这都是因为害怕化身为钟国母的神通广大的天神降罪的缘故。列宁格勒抄本上的题字证明，不仅在说书人当中，而且读书人当中，也有上述观念。

《西汉演义》（扎丹巴书目第19—21页）。见于“列宁格勒书目”，因此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藏有抄本（见《联合目录》255页）。

《东汉演义》与前书大致同时撰成的一部小说。（扎丹巴书目第47页；海西希《蒙古文学史》第一卷第267页）。中国藏有抄本（见《联合目录》298页）。

《昭君传》蒙文书名《Ke van juwan-u bičig tuγuju》。是否自该书译出，还有待考订。

《三国因》亦名《半日阎王全传》，为短篇话文，讲书生司马貌下阴曹替阎王断冥案种下三国前因的故事。这是一篇稀见小说，孙楷第书目未录，但柳存仁做了著录。有满文译本^⑧及两种书名互异的蒙文不同译本（分别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

图书馆和达木丁苏伦收藏)。汉文原书最近在台湾印了两个版本。“列宁格勒书目”中提到此书，证明蒙译本完成于十九世纪中叶之前。达木丁苏伦藏本题名为《Erte čartu erlig-un oron-a kereg sidkegsen Sema Mao-yin debter》(阎王司马貌断案故事)。中国藏有抄本(见《联合目录》277页。书名为《司马貌阴曹断案的故事》)。

《三国演义》 蒙古研究者索特那木以为此书蒙译本是由满文转译。^⑩但此说确否还需查证。1925年在辽源出版蒙文《(新译带批)三国演义》，1928年出版特木格图新译石印本，现在的铅印本(呼和浩特，1959)就是以它为底本的。“列宁格勒分所”还存有自成一册的蒙文《三国演义》主要人物表。在中国小说刊本中，为便利读者起见，有时印有类似的人物表。

《花木兰》 据说书人朝音和尔及三宝达希提供的口头材料，有十册一套的抄本若干种^⑪。另有《唐朝平北传》，亦可能是同一作品(均见《联合目录》301, 302页)。

《隋唐演义》 蒙译本书名为《隋唐》，“列宁格勒书目”收录。斯德哥尔摩民族志博物馆所藏书名为“Sui ulus-un Ĵan tai jin bičig” (隋朝张泰金〔?〕传)的蒙文抄本，或许就是这部小说的译本，但其底本也可能是另一部少见小说《隋府记略》，东京静嘉堂文库就有该书的蒙译本。中国藏有抄本(见《联合目录》283页)。

所有中国小说蒙文译本中，最难鉴别的莫过于演唐代事的作品。这类抄本数量在十五部以上，都还未经过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中可能有十九世纪蒙古本地作家撰写的蒙文原著，如书名为《五传》的一套小说就是。我们列出的抄本，只

限于查明了汉文原著的。

《说唐》 绣像蒙译本，书名为《大唐开国记》，存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该馆还藏有另一抄本，书名为《唐朝演义》。另，《联合目录》320页提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蒙文抄本64回，疑是《说唐》的简译本，待考。

《罗通扫北》 已知两种抄本：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旧抄本，书名为《大唐罗通扫北传》；另一种是较新的本子（1925年），书名为《罗通》，达木丁苏伦收藏（两种抄本都已残缺）。中国藏抄本五种（见《联合目录》285页）。

《薛仁贵征东》 这部小说以及根据它编成的一连串故事，蒙古人简称为《辽东》。此书译本已知有几种抄本。例如，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藏有一种，书名为《大唐薛礼平定辽东记》^②；另一种蒙译本书名为《Yeke Tang ulus-un tung liyoo-nu...debter》（《大唐辽东……记》），见海西希《蒙古文学史》第一卷第268页。在中国发现了三个较晚的（1927，1937年）抄本（见《联合目录》286页）。

《薛丁山征西》 为前书续集，蒙文译名《大唐平定西凉传》（伯克利大学藏）。中国藏抄本两种（见《联合目录》302页）。

有一部尚未查明中国原作的名为《Yeke Tang ulus-un sijai-tang-yui bičig》（大唐谢唐遇（？）传）的译本可能也是薛家将故事之一种。乌兰巴托及“列宁格勒分所”、弗拉基米尔佐夫藏书中都存有二个名称的抄本。因为“Sijai”字亦可对译为汉文的“薛”字，抄本开始部分提到的主人公姓名或可还原为汉文的“薛保郎”三字，另外，故事发生地点是薛仁贵

的家乡龙门县，所以我们揣测它属于薛家将小说系统。列宁格勒抄本第二十二册上，写有这一小说的另一书名《Siĵi-pai yuvan-u bičig》（谢丕传？）。海西希著录的现存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内两个抄本《Yeke Tang ulus-un Sang si qui keme-kü bičig》（大唐Sang si qui传），可能也属于这一套小说的范围，但这个问题有待专门研究。乌兰巴托抄本分四十回，列宁格勒抄本共24册。中国有两个抄本（见《联合目录》302页，书名为《谢唐遇（谢丕）传》）。

《反唐演义》 蒙译为《新刻带批足本反唐演义》。有几种抄本，一种是在乌兰巴托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一种存莱比锡，经海涅什鉴定，断为十七世纪抄本，显然是误断。另一种为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所藏（见《联合目录》286页）。该目录240页所载《（新刻异说）南唐演义全传》一百回，大约也是《反唐演义》，因据孙楷第《书目》，1816年所出《反唐演义》即题为《南唐演义》。《反唐演义》亦名《大唐中兴演义传》，故《联合目录》291页所载《（新刻异说）大唐中兴后续传》亦可能与此书有关。

《粉妆楼》 蒙译《唐朝粉妆楼演义》。（扎丹巴书目第63页）。中国有抄本（见《联合目录》305页）。这部小说在蒙古极风行，对蒙古小说创作发生明显影响。蒙古著名小说《五传》是作为这部小说的续集在十九世纪撰写的^②

《残唐五代史演义》 蒙译本简单写为《唐朝演义》（扎丹巴书目，第62页）。根据各种情况判断，蒙译本所据是该小说的对文回目旧本（东京内阁文库存有这种版本^③）。

《北宋志》 原书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蒙名《Qoyitu süng ulus-un üliġer-un bičig》。所存抄本颇多，但书名有一定差异。例如其中有的称为《兴宋传》（扎丹巴书目第98页），弗拉基米尔佐夫1927年在北京所得抄本，

即为此名。我们在蒙古国家图书馆读过两个抄本，编号都是895.1/X—42，但书名略有差异。一个是《Qoyitu sūng uᠯus-un terigun》，（北宋首），五册十卷，保存完整；另一个是《Qoyitu sūng uᠯus-un bičig》（北宋志），每卷一册，缺六、八两册。两种抄本每册均有满文尾署“终”字，译诗用满文格律，似是由满文转译的，或许都是同书译本。

《五虎平南演义》 蒙译《宋蛮两国演义》，别题《狄青平南传》（扎丹巴书目第102页）。中国藏有抄本（见《联合书目》287页）。

《杨家将演义》 蒙译抄本目前还未能发现，据蒙古说书人朝音和尔谈，他在乌珠穆沁王府中曾读过此书十八册旧译本。

《万花楼》 杨家将小说续集，未见抄本。据蒙古说书人三宝达希谈，有这部小说译本四册。

《英烈传》 蒙译本书名与汉文书名相同（扎丹巴书目第49页），“列宁格勒书目”中提到这个译本，足证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译成的。

我们知道这部小说有数种别本，其中一种《皇明英烈志传》也译为蒙文，书名是《明朝洪武兴隆传》。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存抄本，共十二册，每册五回，署抄书人姓名十人，表明现存抄本不是译者本人所写。“列宁格勒书目”中，除有《英烈传》抄本十二册外，还录有一部《英烈春秋》，四十八册。不知道此书目编者拥有的是哪一种本子的蒙译本。中国存有蒙文《英烈春秋》抄本（见《联合目录》245页）。

如果考虑到，乌兰巴托《英烈传》抄本，薄薄的一册，就

容纳下全八十回中的十回，上面提到的别本《皇明英烈志传》，也一共只有十二册，那末四十八册的这种，究竟是译自哪一种别本，实在是难以揣测的。

演明末事的，有一本少见小说《铁冠图》，记李自成起义始末，立场是反人民的。此小说很可能有几种别本，因为蒙古国家图书馆所存二十九册书名较长的蒙文译本《分段明史铁冠图》，回数极多（二百另五回），而从末册尾署中看出，全书还未抄完。若干册合为一集，共十一集（可能相当于汉文原书的卷），单行回目，是中国小说的早期形式。例如，第二回标目为“丑贼婆设计害二人”，而现存五十回本《铁冠图全传》第二回的回目则是“李自成初受官刑，米脂县先罹杀运”，证明两者有根本区别。蒙译本以哪一种书为底本，目前尚无法查明。

还有若干蒙文作品，似乎也是中国讲史小说的译本，但我们未能查明其汉文原作，开列如下：

《Qan ulus-nu šeng su gi nu bičig》（汉朝生苏记？）抄本一存东京东洋文库（波普《东洋文库满蒙部书目》），另一种是弗拉基米尔佐夫所购，现存苏联“列宁格勒分所”。一百二十回，讲汉初七国之乱及文、景时事。《联合目录》301页所载《大汉国生苏记》当是此书。

《Qan ulus-un sioi qan giuwan-u bičig》，也存于东洋文库。该文库书目编者把这个书名译为《续汉书》，看来不确，可能是前面已提到的《东汉演义》的另一译本。

《Yirtinčü-yi sergegüi kemekü teüke》（宇宙再生记），抄本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志博物馆（Aalto P.A. Catalogue of the Hedin Collection of Mongolian literature. Stockholm, 1953.p76）。据海西希教授介绍，是演明代事的小说。需要见到抄本，才能勘定原著。

《In (Ke) tayisi-yin bičig》（In ke太子传），一册四

回（扎丹巴书目第11页）。

尚未查明原著的，还有两种演清初事的蒙译小说。一种是《我大清朝开国皇帝顺治出家记》，（Heissig W. *Catalogue of Mongol Books,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Copenhagen, 1971. p97）。抄本用满文署“红鸡年”，可能是公元1837年或1897年。据海西希谈，内容与1663年顺治帝并非崩殁而是循迹禅林的传说有关。中国现存关于顺治皇帝的小说有《顺治过江全传》，但据柳存仁介绍，所讲的是与李自成起义有关的较早的事情。另一种小说，是清朝仁宗皇帝（嘉庆）故事，抄本书名各异。如乌兰巴托抄本书名为《嘉庆皇帝故事》。其它抄本存于哥本哈根以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书名为：《Dayičing ulus-un Jiya čing ji-u panja terigün》，四册四回。小说前部记乾隆皇帝从众多皇子中选继位人事，以及请西藏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入京事。中国几个图书馆藏有的蒙文抄本《乾隆皇帝禅位的故事》（见《联合目录》297页）可能就是此书。此外中国尚存有记嘉庆皇帝事的蒙文抄本两种（见《联合目录》276页《嘉庆皇帝私访通州》、289页《嘉庆审辨和绅小说》），但都不知底本为何书。

除以上讲史或拟讲史的作品外，译为蒙文的还有不少烟粉类小说。中国最早的长篇人情小说《金瓶梅》1708年就已译为满文，后来又由满文转译为蒙文。蒙译完成年代以及先后共有几种译本，还没有查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六种抄本，其中书名为《Jing ping mei kemekü bičig》（金瓶梅）的一种抄本，有以下题署“达瓦、吉达木等人奉敕于1910年由满文将此书译为蒙文”。但这部小说的蒙译文已见于“列宁格勒书目”，说明它显然不是最早的译本。

比《金瓶梅》晚出两个世纪的曹雪芹名著《红楼梦》很早就引起了有文化的蒙古人的注意，现存原属蒙古王府的《石头记》乾隆年间抄本便是证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名叫哈司

包的蒙古文人撰写了《红楼梦》的蒙文简本（四十回），并作了序言（1847年）和大量评注。这个书名为《新红楼梦》的蒙文译本，现已发现六种抄本。东京静嘉堂文库、乌兰巴托（扎丹巴书目，第28—36页）各存一种，内蒙有四种。这个译本因有创作性质（撰写简本要求高超技巧）以及有独特的评语，近年来引起中国研究者的特殊注意。乌兰巴托抄本有1819年蒙译者序言，署名杭布，以释道两家思想解说《红楼梦》，强调“因果报应”，“否极泰来”，并杂以儒家的文艺观。1976年在内蒙出版了由三位当代译者翻译的《红楼梦》蒙文全译本。

其它中国烟粉小说，蒙译保留汉文原书名的，有以下几种：

《平山冷燕》 扎丹巴书目第112页，仅存第六、七及末（十）册。

《绿牡丹》 有蒙译抄本数种，一在乌兰巴托，一在东京静嘉堂文库，书名各异。前者保留汉文书名的译音，后者是原书名的蒙文意译。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有残本。

《二度梅》 有译抄本四种，书名各异。弗拉基米尔佐夫1926年在北京所得抄本，书名为《大唐二度梅》，现存“列宁格勒分所”；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存抄本三种，其中最完整的抄本书名是《忠孝双全二度梅传》（扎丹巴书目第11—12页）。中国藏有两个抄本（见《联合目录》250页）。

《五美缘》 蒙译本保留汉文原名。（扎丹巴书目第17页）。

东京静嘉堂还存有一种烟粉小说《锦香亭》的蒙文译本，在其它目录中都未见到。

《蝴蝶媒》 蒙译抄本藏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见《联合目录》264页）。

此外还有若干抄本，也都是描绘世态人情的中国小说的译文，但其所据原书暂时还未能断定。例如，我在蒙古国家图书馆发现一本小说，叙述早歿举人Yin (Jin?) Go-cai(殷国才?)的寡妻刘玉仙历尽苦厄终得报偿的故事。抄本题名《人间兴旺史刘玉仙故事》（一册，一二二页，五回。扎丹巴目录未收）。故事发生在明洪武年间，疑与海西希在斯德哥尔摩博物馆发现的《人间初始记》抄本是同一作品。另，书名为《宋朝李康（清经）两员外结义记》的抄本，所据何书也不能确定，疑是中国小说《两交婚小传》的译本，惜未能见到原书；蒙古国家图书馆存有这两种抄本。属于此类的，还有一部名为《čen čai jin-u teüke》（陈才金〔?〕传）的小说，叙王丞相之子王古（如？）玉和陈尚书之女陈才（赛？）金悲欢离合故事；蒙古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看来是直接自汉文译写时的原稿。另，书名为《či ling men》（麒麟梦）的译本（列宁格勒大学图书馆藏）也不能断定来源。此书抄本共三册，分章回，末署“足译本”，故事发生在宋代。

海西希教授在有关著作中也简要列举了德国和哥本哈根收藏的至今未经研究也未查明原著的若干蒙文抄本^②。

灵怪小说在蒙古人当中可能比烟粉小说更为流行。其中最风行的是《西游记》、《封神演义》和《济公传》。

吴承恩《西游记》蒙译抄本，已知约有二十种。分别存于乌兰巴托、呼和浩特、列宁格勒、布达佩斯、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日本天理大学。乌兰巴托所存十三种抄本中，五种题有识语，称这部小说蒙译本最早完成于1721年。据蒙古研究者图门扎日嘎勒推测，是满蒙字典编纂者之一语言学家阿拉纳所译。这部小说引起蒙古读书人注意的时间，比其他小说都早

（大约与《钟国母》同时），这是由于当时蒙古人对这部作品作了特有的佛教解释的缘故。蒙古读书人把它看作佛教劝世经文一类的东西，认为是讲述凡人（玄奘）得道的故事。图门扎日嘎勒查明，现在存有这两种不同的《西游记》译本，另有一种综合性的译本（前三十章借用第二种译本的译文）^⑤。这部小说的蒙文书名为《唐僧喇嘛》。

《封神演义》 蒙译抄本存乌兰巴托、呼和浩特、北京、哥本哈根、与列宁格勒。译本收入“列宁格勒书目”，说明完成于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相传为蒙古作家尹湛纳希所译^⑥，但未见翔实的证据。对比蒙古图书馆现存的三个蒙文抄本，可以看出是三种不同译本。列宁格勒抄本尚未经过考订。各译本书名都有些差异：《Qubilγan ergumjilegsen teūke-bičig》（封神故事，蒙古国家图书馆）；《Juu ulus-un bičig》（周书），副题《封神演义》。

《济公传》 讲济公故事的小说有数种，现存大量蒙译抄本，看来是不同原作的不同译本。“列宁格勒书目”中录有《醉菩提》译本，说明完成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抄本书名大多有差异，有的称《济公》，有的称主人公浑号《济颠》，但相当多的是用《šen čin hoi》三字，当是汉文《圣禅会》的音译。如著名蒙古学家兼汉学家潘克拉托夫收藏的十二册抄本，书名即为《šen čin hoi kemekü bičig》（圣禅会演义），现存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汉学图书馆。藏有此书抄本的尚有：蒙古国家图书馆，达木丁苏伦藏书，“列宁格勒分所”（不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另有丹麦中亚考察队1939年从土默特、察哈尔地区带回的两种抄本，现存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自十二回末至十九回中）。乌兰巴托抄本内容为全二十六回，这种回数的本子，不见于孙楷第书目。中国藏有抄本（见《联合

目录》299页。书名为《济公传（圣禅会）》）。

这部小说和《西游记》一样，也在卫拉特人中流行，其证据，就是现在存有用卫拉特人早在十七世纪发明的“托忒”蒙文书写的抄本。这部书早年在蒙古人中风行的原因，看来也是因为对它做了佛教的解释。蒙古喇嘛崇敬济公，以至用喇嘛视为神圣的藏文撰写了一本《济颠小传》，于木猪（1935?）年在库伦刻板刊行。

《升仙传》 蒙译抄本存蒙古国家图书馆，有序，彩色绣像十幅。另一抄本存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见《联合目录》284页）。

灵怪小说类有一部未查明原书的译本《Utu juwan keme-kü jan tiyen si tabun qooratai simnus-i darurysan teü-ke》，（五毒传又名张天师镇五毒传），蒙古国家图书馆存有已残缺的抄本。此书显系译自孙楷第著录的《混元盒五毒传》。

标目为《秋先花》的蒙译短篇故事，似乎也应归入这一类。主人公是一位酷好栽花的老者秋先，宦家子弟张委带领一班党羽，尽毁老人园中花木；秋先得花神相助，终于得道仙去。抄本存蒙古国家图书馆，当是《醒世恒言》中《灌园叟晚逢仙女》一则的译文。

按中国传统分类法，侠义公案小说属最末一类，其中首屈一指的当推施耐庵《水浒传》。蒙文译本有不同书名。有些是原书名的逐字音译，如《Sui qu juwan》，有的是原书名的确切意译，如《Tool-un toqoi》（水浒），另一些（颇常见的）书名中写入《Küiten ayula》（凉山）字样，想是蒙古译者对汉文文字不如对口语通晓，因而把“梁山”误译为“凉山”。图门扎尔嘎著录的另一抄本，书名就写作《Sung ulus-un küiten ayula-yin biçig》（宋朝凉山演义）。

经图门扎日嘎勒搜访，发现《水浒传》两种蒙译本^②，二

者似乎都以十七世纪金圣叹批七十回本为底本，但蒙译本中有些段落，为标准的七十回本中所无。图门扎日嘎勒推测，是蒙古译者增添的。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蒙译本，完成于十九世纪上半期，部份出于尹湛纳希的兄弟——诗人古尔兰萨之笔。“列宁格勒书目”录有这个译本，书名为《Sui qu》。较晚的译本完成于1909年，译者是蒙古官员乌尔济伊特（汉名温绳武）、巴丹策伦和错博德拉赫三人。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有石印本，出版年不详（见《联合目录》285页）。《水浒传》蒙文新译四卷本1978年在内蒙出版。

《禅真逸史》 存蒙古国家图书馆（一至四十回），抄本为经叶装，红绢书衣。

《三侠五义》 蒙文译本出现于1907年，据我所知，这是此书第一次译为其它语言。蒙文抄本书名为《三侠五义又名包公案》，收藏地同上（扎丹巴书目第88页）。乌兰巴托抄本全三十五册，现缺九、十三一十六、三十一三十五各册。

这部小说问世后，续作和仿作不下二十余种，其中有的也译成了蒙文。在蒙古人中风行的有《小五义》，留存三种抄本，蒙古国家图书馆存二种，达木丁苏伦藏书存一种，都已残缺。达木丁苏伦院士藏本书末有跋，内称这个译本曾由肯特省的“文华楼”（？）刻板印行，但因资金不足，未能全部刻完。达木丁苏伦藏本止于八十四回（全书共一百二十四回），大约正是从这个目前尚未找到的刊本过录的。汉文小说蒙译本的刊刻发行，可能始于此。《联合目录》284页载有《宋朝续小五义》（应译为《宋朝小五义传》）即为此书。《九义十八侠》这部少见小说，大概也是这类作品之一种，孙楷第书目、阿英晚清小说书目，都未收录，但见于郑振铎氏藏书^②。我们手头只有1970年台北印行的新版。据老说书人朝音和尔告知，有手

抄蒙文译本八册，我们从他口中记录下这部小说故事的一部份，但至今还未能发现抄本。

据朝音和尔及另一些说书人谈，石玉昆《三侠五义》还有两部续集《大八义》、《小八义》译成了蒙文，但我们未能找到抄本。

这一套侠义武勇小说，都与廉明清正的法官包拯事迹有关。乌兰巴托国家图书馆收藏蒙文抄本中，有一部书名为《包公传》的小说残本（第十册），有包公断案内容。海西希教授推测是明话本《龙图公案》之一则^②。此外东京静嘉堂文库存一部长达十二册的蒙文抄本，著录书名为《包公案》，想是同书或别本的译本。至于另一种记有三则包公降魔故事的薄薄的抄本《神仙下凡包公勘破祸国妖孽案故事》，是否与前者有关，尚无定论。此书由一位叫米济德的蒙族官员译成于清代“红羊”年。海西希教授推定为1907年，以为是《三侠五义》开头的一段^③，但这部包含三则故事和译者跋语的抄本，显然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出现的时间，也可能早一个“甲子”，即在1847年。

小说《施公案》在许多蒙古部落中极为风行，虽然还不能说已遍及各地。已经发掘出这部小说手抄蒙文译本大约三十种（乌兰巴托、哥本哈根、列宁格勒）。最常见的译名是《Si mergen noyan-u üli ger》（施青天故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抄本书名为《施青天出世故事》。“列宁格勒书目”中录有这部小说，证明翻译的时间不会晚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藏有抄本（见《联合目录》278页）。

除了上面海西希教授推断过翻译年代的包公案话本，还有一部在清代十分闻名的话本集也译成了蒙文，那就是《今古奇观》。第一个译本完成于1816年，地点是在今内蒙，后来又有其它译本出现，其中之一是当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本子。中国所藏抄本见《联合目录》242页。

另有话本集，即凌濛初（十七世纪初）《拍案惊奇》，在蒙古流传的程度似乎远远不及前者。众所周知，这部书是在日本保存下来的，那里也存有手抄的蒙文译本（东京静嘉堂文库）。此书译本极可能抄传于东部蒙古人当中，其间接的证据，就是在东蒙说书人的节目中，有出自这部话本集里的故事。关于日本所藏抄本情况，所知甚少；蒙译究竟是“初刻”还是“二刻”，也难以确定。

本文基本上属于书目性质，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小说蒙译本插图问题，不能详述。已见到的，有《红楼梦》、《今古奇观》、《封神演义》及其它小说的彩色及黑白的绣像。蒙古国家图书馆还藏有《西游记》和《施公案》多色插图两大册。关于译文的特点，如有些译本和原文十分贴近，而另一些则在某些地方似乎相距甚远（如果我们用来对照的原书没有选错的话），也无法细谈了。特别是小说中间杂的诗歌的翻译问题，颇值得单独谈谈。据我们所知，蒙古人对汉诗不感兴趣，没有专门译过诗作，（满人和马来人也没有译过；泰文等其他东方语言，似乎也没有汉诗的古译本，然而翻译小说之风，则是很盛的）。蒙古译者有时把诗句撇开不译，但也常常以诗体译出；或运用蒙古诗歌特有的字首同音法，或以不明确分行的押韵散文形式加以表述。为了把简短的汉文诗句变为字词较多的蒙文句子，译者想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把每一句汉文诗（在停顿处）分为两行，四行诗变成了八行诗。（有趣的是，俄译者译中国旧体诗，也采取同样办法）。

中国旧小说的蒙文译本（大概也应包括其它民间文学作品，如鼓词、弹词之类的译本，但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深入研究）对于蒙古书面文学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尽管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蒙古人，其所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在早期的蒙古小说中，这种影响特别明显。在题材、人物描写方法、情节组织、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表现。但蒙族早期小说的作者们

并不是盲目的模仿者，他们以创造性的态度接受其它民族的遗产。改编和续编汉族古旧小说的东蒙地区的说书人对这个整体说来具有民主性的遗产，也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加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初，汉族文学对蒙族文学也起过一些中介作用，若干西方文学作品最初是由汉文转译为蒙文的。例如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蒙话报》第15期发表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十五小豪杰》汉蒙对照第一回，其蒙文就是从梁启超的中译文转译的。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佚名的蒙古译者们一共翻译了中国古旧小说八十余种，比任何其它文字的这类译本，数量上都要多些。中国小说蒙文译本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还刚刚开始。毫无疑问，在内蒙地区的查访必能提供许多新的和独一无二的材料，它们不仅对于蒙古文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中国文学以及曾起过媒介作用但本身已成为历史陈述的满文翻译文学的研究，都会有重要的意义。

① “本子”“乌里格尔”一词，由汉文“本子”和蒙文“乌里格尔”（故事）组成。蒙古仁亲院土在《蒙古民间文学中的本子乌里格尔体裁》（乌兰巴托，1959）报告中第一次描述了这种创作体裁。较详细的介绍，见海西希《蒙古文学史》中的一章（W. Heissig. *Geschicht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 Bd.2, Wiesbaden, 1972, S. 835—877.），此章英译文载《*Orientalia romana*》，1972, No.4.篇名为“New Mongolian Minstrel Poems”。李福清与策伦索得那木合写的论文《本子乌里格尔故事及文学与民间创作的相互关系问题》（《蒙古的文学联系》文集，莫斯科，1981年）提供了有关此种体裁的最新资料。

② 见：海西希《蒙古文学史》第1卷，第307—321页；J. Gombojab Hangin, *Köke Sudur (The Blue Chronicle)*, Wiesbaden, 1973；（贡保扎布·杭锦：《青史演义》）；

Ch. Bawden, Injanasi's novel Nigen dagbur asar—
“Studia Sino-mongolica”, Wiesbaden, 1979, S.198—
221; (鲍登: 尹湛纳希小说《一层楼》); A. C. Clunas,
The Preface to Nigen dagbur asar and their Chinese
antecedents—“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Bd.
14/1, Wiesbaden, 1980, p.139—194. (克鲁纳斯: 《一层
楼》序言及该小说的中国兰本)。

- ③ I. W. Grube, Zur Pekinger Volkskunde, Berlin,
1901, S.133. (格鲁伯《北京民间艺术》)。后来德国海涅什
教授将此译本与中文原本进行了对照, 并在一篇论文中做了
探讨。见E. Haenisch, Der Chinesische Roman im
Mongolischen Schrifttum—“Ural-Altäische Jahrbuch”,
Bd. 30, Hf.1—2. (《一部蒙文中国小说》。)
- ④ B. Laufer. Skizz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
“Revue Orientale”, 1907, v. VIII. (劳费尔《蒙古文
学史纲》)
- ⑤ 见梁一孺: 蒙古文版《新译红楼梦》评介。《红楼梦学刊》,
1979年第2期, 第199页。另见《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
录》第265页。
- ⑥ 《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内蒙人民出版社, 1979。
- ⑦ 弗拉基米尔佐夫所购现存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抄本中未
见此书名的小说。可能是误记。
- ⑧ 海西希教授在莱比锡还发现了一部未查明中文原书的小说译
本, 书名为《姻亲愿》, 1927年北京出版, 似乎也是该社出版
物。
- ⑨ 《(选译)聊斋志异》, 特木格图译, 八卷八册, 一一一篇。
北京蒙文书社, 1928年铅印本, 藏北京图书馆——译者。
- ⑩ 见《三国演义》蒙译本, 北京, 1928, 第2页。
- ⑪ “Ulus-un nom-un sang-un aji-yin anggi-du buqui
mongol anggi-yin bičmel ba darmal nom bičig-yin
büytgel. Ulayan bayatur. 1937.
- ⑫ žadamba. Ulsyn nijtijn nomyn sangijn bičmel uran

- zohiolyn nomyn garčig— "Studia Mongolica", 1, fasc. 11. Ulanbator. 1960.
- ⑬ W. Heissig. *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 Wiesbaden. 1961; W. Heissig (assisted by Ch. Bawden). *Catalogue of Mongol Books,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The Royal Library)*, Copenhagen, 1971.
- ⑭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台北, 1974。
- ⑮ 见波普等编《东洋文库满蒙部书目》;《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续集, (1951)。但静嘉堂文库目录中所收的译本, 究竟是译自该小说的早期版本还是书名为《东周列国志》的蔡元放评定的较晚版本, 不甚明了。日本目录的书名为后者, 未录蒙文译名。
- ⑯ 谭正璧在新发表的关于木鱼书的文章(《释木鱼歌》)中也提到这部作品(《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
- ⑰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北京, 1961年, 第318页。
- ⑱ 沃尔科娃《苏联科学亚洲民族研究所满文抄本著录》, 莫斯科, 1965, 第95页。编者误将此译本列入满族民间文学作品类。参见戴不凡《小说见闻录》, 杭州, 1980, 174—179页。
- ⑲ 见索特那木《蒙古文学发展史》, 上海, 1957, 第43页。
- ⑳ 与这几位说书人多年的工作交往以及在可能条件下对他们提供的材料进行的反复查证, 表明他们的话完全可以信赖。他们对以前读过的抄本, 连册数也总是记得很准确的。
- ㉑ 海西希《蒙古文学史》第一卷, 第268页。
- ㉒ 见《蒙古文学简史》, 呼和浩特, 1959年。
- ㉓ 见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 ㉔ 见W. Heissig. *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 Wiesbaden. 1961, S. 92, N145; (海西希《蒙古抄本、刻本、舆图》) W. Heissig (assisted by Ch. Bawdan). *Catalogue of Mongol Books,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Copenhagen. 1971, pp. 98—99. (海西希《蒙古书籍·抄本·刻本》)

- ②⑥ 图门扎日嘎勒《关于〈唐僧西游记〉蒙文译本》，载乌兰巴托《蒙古文学概况》1968年第3卷。
- ②⑦ 史秉麟，《元朝青史》译者的话。台北，1968，第一页。史秉麟以为《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也是尹湛纳希所译。他在给海西希教授的信中说，他是尹湛纳希的同乡，所依据的是口头传闻。
- ②⑧ 图门扎日嘎勒《宋朝凉山演义》，——载于《蒙古文学概况》第3卷，乌兰巴托，1968年。
- ②⑨ 《西帝书目》，北京，1963年，卷四。
- ②⑩⑪ 海西希：《蒙古文学史》每一卷，第269页。

【译者附记】本文译自打字稿，并由译者根据作者在《蒙古的文学联系》论文集中所发表的一篇长文的内容，作了若干补充。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图书馆乌云同志的协助，并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布同志赐教，在此一并申谢。

